



青年学者文丛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中日近代摄取西方政治思潮探微

◎ 王晓范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日近代摄取西方政治思潮探
微 / 王晓范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8-09707-9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
国—近代②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近代 IV.
①D092.5②D09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3993 号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日近代摄取西方政治思潮探微

王晓范 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zerozc@zju.edu.cn)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707-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总 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



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 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 16 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 19 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它社会科学。”^① 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6 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0 页。



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



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



也包括其它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前言

本书是笔者十余年思考与研究所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缘起可以一直追溯到笔者的大学时代。由于机缘巧合，笔者有幸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日本语言文化，从此与日本语言与文化结下了不解缘。但是受到北大关心国是的传统的影响，笔者的关注重点并不局限于日语专业，而始终也在关注与思考着中国现代化的前途与命运。通过日本这个窗口，使笔者有了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与脉络的机会。

笔者对中国与日本历史文化的看法自那时以来，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历经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笔者的研究课题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始终一以贯之的是笔者对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问题的关注，而这些研究重点的转变恰恰反映了笔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认识的转变。

由于对日本的了解尚不够深入，在初期笔者惊叹于日本在明治以后向西方的迅速转变。这也是笔者最初选择日本明治初期影响深远的岩仓具视出访欧美使节团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通过对此问题的考察，希望能够发现为什么近代日本能够迅速地转向西方而中国不能的原因。

但之后随着学识的增长，笔者越来越发现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既深且广，特别是受到黄仁宇对基础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视的影响，在研究生阶段又转向了日本近代财政制度的研究。但是在这之后的研究中又发现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组织的特点密不可分，因此又转向了中日近代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此时虽然对中日两国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差异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这时的关注重点仍然停留在制度层面。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虽然制度与组织的差异在



解释现代化的差异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制度与组织的构成与差异毕竟是静态的，而使制度与组织的特征所由形成的基本动因却是动态的，这些深藏在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的诸因素往往构成了一个民族生成、发展、兴盛、衰亡的基本基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又将研究重点转向文化的原因。

通过研究，笔者越来越发现在近代世界交通高度发达以前，一个民族的组织与制度的基本特征往往可以追溯到这一民族所处文化圈与文化类型的初始阶段。这一传统的影响极其深远，虽然其间可能历经重大的发展与转变，但其中的某些基本特征往往贯穿于这一民族文化发展的始终，而且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本书试图从中国、日本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中日近代试图吸取西方近代政治文明时所遭遇的困境，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对理解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需指出的是，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态度自学生时代以来也历经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身上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断层，同时由于从小受英语环境的熏陶，笔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一度表现出轻视的态度。但是由于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笔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到了日本之后，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典籍，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发生了更大的改变。虽然笔者现在依然认为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部分仍然需要批判性的继承与扬弃，但是对于生存其中的先哲与知识阶层已有了更多历史的同情。

当然，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本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多多给予批评指正。只希望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使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地向纵深发展，为现代化这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基本课题提供更多的借镜与启发。

王晓范

浙大紫金港 2012 年 5 月



目 录

一、绪 论	1
(一) 研究之目的与意义	1
(二) 研究之方法	4
(三) 研究现状	6
(四) 一个关于中西日思想史的一般性比较	16
(五) 本文研究对象与章节构成	29
二、中日近代对卢梭民约思想摄取之比较	34
(一) 明治日本对卢梭民约思想之摄取及其特色	34
1. 中江兆民在日本对卢梭民约思想的译介	34
2. 对明治时期与卢梭民约思想不同的数种政治思潮的考察	42
3. 中江兆民对明治实际政治状况的批判	57
(二) 中国近代对卢梭民约思想之摄取及其特色	61
1. 刘师培对卢梭民约思想摄取的特色	61
2. 梁启超对卢梭民约思想的摄取	70
3. 康有为对卢梭型共和主义思想的反应	77
4. 严复对卢梭民约思想的反应及其自由观的特色	84
(三) 中日近代摄取卢梭民约思想特色之比较	95



三、中日近代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摄取之比较	101
(一) 小野梓的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理解	101
(二) 梁启超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解	111
(三) 小野梓与梁启超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理解之差异及原因	119
四、中日近代摄取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思想之比较	122
(一) 加藤弘之对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学说的理解和摄取	122
1. 加藤弘之接受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学说的特色	126
2. 加藤译伯伦知理著《国法泛论》中国国家组织的基本特色	130
3. 加藤弘之政治思想之特色	133
(二) 梁启超对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学说的理解和摄取	136
(三) 加藤弘之与梁启超摄取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思想之差异	141
五、结语	143
(一) 中日近代摄取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143
(二) 上述特征对中日现代化进程之意义	147
参考文献	152
附 录	159
后 记	187



一、绪 论

（一）研究之目的与意义

近代以降，中日两国都被卷入了遭受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浪潮，为了应对此冲击，两国被卷入调整自身的巨大变动中。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使自身文明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现代化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课题：（1）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即经济活动由自律性的高效率组织承担而实现现代经济成长；（2）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即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实现政治性决策的大众参与制度化，而政策实施由专业化的具高度能力的科层制组织承担（民主化）；（3）社会与文化（狭义）领域的现代化，即在社会层面，由血缘纽带构成的具有包容性的、未分化的血缘亲族组织分离出功能分化且具特定目的的组织（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在文化层面即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从古代中世纪的作为一种传统的旧习、迷信、巫术的不合理制约中摆脱出来，在思想与宗教等诸多领域中推进追求合理主义的文化变迁。^①

在第一、二层面，即在经济组织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现代化的官僚组织层面，上述现代化的概念与比较的基准具备相对的客观性与统一性，第一、二层面的现代化往往意味着西方化的过程。但在第三层面，即社会组织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特别是

^① [日]富永健一著，李国庆、刘畅译：《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5 页、第 34-35 页。



精神文化层面，各个特殊的文化都具备高度的特殊性。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完全的西方化，虽然富永把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归纳为“合理主义的实现”。^①但此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合理主义的态度都是建立在原有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之上的。虽然笔者并不持完全的文化决定论观点，但不得不认为，第一层次的现代化与第二层次的现代化同样要受到第三层次现代化，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现代化的重大影响，甚至第一与第二层次的现代化的基本性格，实际上往往也是由第三层次现代化，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现代化的特色所决定的。

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往往面临着传统文化价值与西方文化价值如何接榫的问题。对于非西方文明来说，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与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融合与成功转化。但是如接下来的研究将表明的，实则此往往意味着两种文化价值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在冲突中的逐步转变，此种转变都不得不要受到原有文化基本价值的深刻影响，而此种转变之成功与失败及其特性都隐藏在原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中。

有一种倾向认为相较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日本文化传统中具有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传统。因此在近代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其吸取西方文化的态度相比于中国大为积极，其自身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的相互融合与转化，也比中国要顺利与成功。^②笔者认为此类观点只说出了事实真相的一面，而且有低估中国文化自身的巨大包容力与适应力的危险。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中日两国在近代吸收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不同态度，来理解同为非西方文明，且处于同一东亚文化圈中的中日，在试图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接续与转化方面各有何特色，而造成这些基本特色的原因何在。通过此研究可以为研究非西

① [日]富永健一著，李国庆、刘畅译：《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5 页、第 35 页。

② 参见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132 页。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从英法思想向普鲁士德意志思想的转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3-208 页。



方文明的现代化模式提供比较的视野与具体的实例，从而对非西方文明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顺利接续与融合提供有益的启示。^①

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对于近代中国与日本来说，都是其能否实现应对西方文明的全面挑战，实现自身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

相对于在物质层面与经济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相对顺利（虽然中日存在一定的差异），引进西方的政治文明，对近代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引起激烈争议与巨大冲突的问题。正如本研究将要揭示的那样，引进西方政治文明内含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基本价值与文化信念比引进其表面的制度文明还要困难。

正如富永指出的那样，西方的现代化是先从第三层面即社会的现代化（氏族的消灭与自治城市的兴起）与精神领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现代化，向第二层面的现代化即政治的现代化（市民革命），再向第一层面的现代化即经济现代化（产业革命）发展的，而非西方后起社会的现代化的发生顺序，正好与此相反。^②

这一点在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同样表现出来，虽然由于各自社会历史的差异，日本相对于中国，在第一层面即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方面的表现要大大优于中国，但在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都同样面临严重的困难与冲突，即使两国之间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本论的目的在于揭示中日两国在引进近代西方政治文明时所遭遇的困难与冲突的核心原因，即西方政治文明中所包含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核心价值与中日两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因此本文并不着重于探讨近代中日两国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实现了多大程度上的西方化与现代化，而着重于研究决定与影响引进具体政治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原因，而研究此点的最佳切入途径，即研究近代中日两国在摄取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与特征。二者在摄取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又都表现出了哪些特征与差异，这些特征与差异与其文化传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些文化传统

^① 现在随着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人们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具有怎样的价值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同为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其文化传统对于实现现代化又有什么样的作用与价值仍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② [日]富永健一著，李国庆、刘畅译：《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页。



对于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哪些方面是积极的，在哪些方面是消极的。这些对理解与评价中日两国自身文化的价值及存在的问题，以及文化传统在向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论拟选取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①、英国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与德意志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选取此三种政治思想的原因在于，这三种思潮分别代表了法兰西共和主义思潮、英国型经验论的自由主义^②和德意志近代国家主义思潮。而此三种思潮在明治日本与清末中国，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与各自不同的反应。其中有的思潮与中日两国各自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甚至对各自近代化的进程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代表 18 世纪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卢梭民约论，与强调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的 19 世纪经验论自由主义、强调历史主义及国家在历史中的重大作用的德意志国家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冲突，这种冲突在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中，又有相当不同的表现，而此种不同的表现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特质。本论试图分析这些冲突与异同，来揭示这些特质并加深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理解。

（二）研究之方法

本论以西方政治思想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摄取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学科，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得不采用综合的方法。

首先，本论以中日比较为基本目标，所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采取比较的方法。

① 由于在明治日本与清末中国都将卢梭的社会契约称为民约，为尊重历史现实，以下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统一称为民约论，下同。

② 本论拟研究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伦理学部分与政法论部分，虽然本论的着眼点在于边沁的政治思想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但由于其伦理学思想部分是其政法论的基础，所以必须研究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的伦理学部分而实际上其伦理学部分在中日的不同摄取与反应恰恰反映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特质。



且由于研究的重点为西方政治思想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反应，因此始终采取西方与中日三者比较的立场。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文化传统，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日日耳濡目染而不自知，而对比的方法，能够使人跳出自身认为理所当然的既定处境而发现新的意义，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对比与分析，近代中日摄取西方政治思想的不同特质，自然就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但是，如果只是在横向的空间上加以比较的话，则分析将缺乏纵深，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不断生长发展的。如不理解事物发展的来源与传统，则无法真正深入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本质，所以除了横向的比较研究以外，必须加以纵向的比较与历史研究。由于本论着重于思想的比较，所以同时必须采取历史的研究法。

而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任何思想的特征都必须从代表思想家的著作与叙述中，通过实证地分析归纳而得出。但单纯的实证方法仍有其缺陷。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个人特性与社会环境交互影响的产物，所以必须把思想家的思想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加以研究，否则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所以，本论在研究中日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摄取时，也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在思想的研究中，注重比较由此思想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经济形态、民族特性与风俗习惯等背景。在此大背景下，须研究与把握思想的一般特性与趋势，而不能只就思想而研究思想，必须注重对当时整个社会思想风貌的把握，并深入挖掘此思想特征所形成的基本原因。

由于本研究的对象着重于政治思想，所以，在研究中同样不能不采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政治思想对于实际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的影响，以及此政治思想所代表的基本的政治倾向及特色。由于何种目的与实际政治的考量而主张此种思想，不仅要研究此思想在原发源国的政治背景，也要研究此思想对近代中日两国的实际政治状况的影响。

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在近代主要采取法律的形式，所以研究政治思想同样不能不采取法学研究的方法。在研究政治思想时，也要着眼于此种政治思想所反映的实际法律法规的特色，以及由此种法律法规所成立及实际运用中的思想与理论背景。从一些